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五九期 ——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9c)

【劫后反思】	文革中向达的受辱和几十年后的思考	伍 国
【拒绝遗忘】	徐星：用细节戳穿“文革”的谎言	文 涛
【历史镜鉴】	这些老女生究竟要干嘛？	冯敬兰
【往事非烟】	一个北大学生文革日记（之三）	扬子浪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劫后反思】

文革中向达的受辱和几十年后的思考

• 伍 国 •

北大历史系教授郝斌的《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今年（2014）年一月由台湾大块文化公司出版，立即在网上引来不少关注和评论。托人从香港订购来，再寄到美国家中，手不释卷地读完，感触真是良多。

关于北大“牛棚”的反人类的暴行和受虐者的心境，季羨林的《牛棚杂忆》（1998）写得也十分细致，但《流水何曾洗是非》与之相比，不仅涉及一个人自己的经历，还有众多中国一流学者的群像，他们中有向达，邓广铭，周一良，罗荣渠，邵循正……也提供了更多关于暴行的细节材料。作者对于几个当年作恶多端的北大学生红卫兵，直称其名，决不用XXX代替，让人感到畅快。更重要的是，作者对文革中的一系列现象进行的剖析和反思，使得这本书的深度超过一般的回忆。

作者亲眼目睹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的奠基人向达在1966年的一天的受辱经过：红卫兵抄了向达的家（行话曰“采取了革命行动”），发现向达的茶几上放着毛泽东瓷像，对面桌子上是一只张着嘴的老虎。红卫兵（注意此处不是中学红卫兵而是北大的学生）坚持认为老虎张

着嘴对着毛主席，说明向达在发泄对伟大领袖的仇恨。

作者描述出身湘西土家族，性格倔强刚毅（书中有例子，此处不重述）的向达此时“讷讷无言，没有分辩，没有反抗”，“屈倒双膝，跪倒在毛主席像前，并遵照学生的命令一字不差地口念：‘我有罪！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四十年后，郝斌对这一幕的反思在于几个方面：

一，对于学生的思维逻辑。郝斌写道：“……也许有人会问：是这两个学生智力低下？还是他们无理取闹？我们可以断然回答：都不是！……任何一个人，包括我，甚至向达先生本人，凡是亲临其境的，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两个学生是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说话，呼吸，都有一股堂堂浩然之气……我们深知，这不是个人行为，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全校的学生，乃至千百万的同龄青少年。”他认为，学生是被控制和操纵的：“在那个年代，在为理性的温床已经形成之际，偏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以为民心可用的权术之士，从中操纵，上下其手……他们的推波助澜……害得整整一代青少年染上了恣意追求情绪和暴力的群体性综合症。”

二，对于责任，可能针对前两年有人就红卫兵暴力问题提出追究老师的责任，郝斌指出，如果个别学生有不良行为，老师难辞其咎，但当时的青少年几乎个个如此。他质问：“这样的责任，是几个当老师的能担当得起来的吗？”

三，对于向达表现出的和本人的见识，阅历，以及“为人憨直，是非分明”的个性不相符的忍耐和顺从，郝斌的推测是：除去无奈以外，“向先生深知，他面对的不只是两个无礼小子，而是一种社会和时代的病症！在他一位饱谙世事的老人眼里，那两个年轻学生，精神已经处于非常状态，病得不轻，他心生几多怜悯也说不定，有哪家的长者会跟自己的病态孩子去较真呢？何况，这还是一种配以暴力的‘红卫兵文化’与弱势的正常文化之间的冲突！”郝斌最后把向达的表现解释为一种“胸怀。”

向达下跪请罪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旁人都只能推测。在我看来，“胸怀”说可能稍微拔高了一些。我想，当一个铁骨铮铮又饱谙世事的老人，一个学养深厚的智者最后变得如此“讷讷无言”，“屈倒双膝”，可能仅仅是出于体弱多病的老人对暴力的恐惧，郝斌在书中描述，在几个小时的罚跪之后，时年66岁的向达已经无力站起来……也可能，向达对他所受到的质问所体现出的荒谬和愚昧程度感到震惊和绝望。向达对于国民党政权和日本侵略者都作出过知识份子的鲜明回应，但面对如此愚昧的逻辑，整个时代深入骨髓的病症，可能会彻底失语。在经历了“集体拔草”的惩罚和那场著名的“集体罚跪”事件之后，他想必已然明白，他正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空前绝后的“病态文化”，而他自己所追求和代表的学术文化，正如郝斌教授所说，只不过是“正常”然而又多么“弱势”的。他已经不可能，也不屑于去回应那些无比荒诞的问题，更不可能去挑战铺天盖地的病态文化，只能选择一种“随你怎么说”的态度了。人面对纯粹的“恶”可能会挺身而出，面对“愚”以及“愚”和“恶”的混合物倒真可能束手无策，缴械投降。

向达于1966年11月24日因病重逝世。

□ 摘自《共识网》

~~~~~

【拒绝遗忘】

徐星：用细节戳穿“文革”的谎言

• 文 涛 •

1米88的徐星，蜗居在京城北部一个老小区不到60平米的小房子里。那是他去世的父亲留下来的。自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失去“铁饭碗”后，徐星的档案也找不到了，他也因此办不了低保，连这间小房子的继承手续，跑过很多次“有关部门”，一直也都办不下来。他反复用“三无人员”来定义这几十年来自己。

徐星一穷二白，在住进这套小房子前，他在劲松的地下室生活过几十年。今年58岁的他，最大的财富，恐怕是所背负的沉重历史。他用笔，用摄像机，记录着过去的岁月，而“文革”，是他最为痴迷的话题。

2006年，徐星开始从一个作家向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转型，时长80多分钟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以独立的视角横空出世。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徐星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没有一个人。”2008年，徐星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强调。

而在今年，他又推出了讲述“文革”的纪录片——《罪行摘要》，这一次，14位“文革”中坐过冤狱的农民站在他的镜头前。

#### ◇ 国家的弃儿

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庄拍摄画家村题材时，认识了一位叫贾和震的画家。贾在“文革”期间被控“现行反革命”，在浙江衢州十里丰监狱农场度过了十年。他用“犯人登记表”的背面偷偷作画，出狱的时候带了出来。表格中的“犯人”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均来自浙江，他们以各种罪名被判处7年至20年刑期。

登记表上的“犯罪事实摘要”一栏，罪名五花八门：包括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10年；冒名撰写反革命信件，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20年；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刘少奇，20年。

“对于‘文革’的反思和记录，无论是文艺作品、新闻报道还是纪录片，绝大部分都把视角集中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身上，比如刘少奇和老舍的遭遇，极少关注底层群体，而农民这一块，基本没有涉及，其实，这个群体的遭遇可能最为悲惨和荒诞。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在‘文革’的研究中是有缺失的。”4月中旬的一天，徐星在北京的寓所告诉《南都周刊》记者。

2011年，徐星拿着22份犯人登记表，按图索骥，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单枪匹马采访到了14位坐过“文革”冤狱的农民，最终剪出了这部135分钟的《罪行摘要》。

今年3月29日，《罪行摘要》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馆放映。“这个片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徐星在现场说。

他邀请到片中的三位当事人参加。其中一位老人讲，作为农民，如果没有徐星的记录，他们的这段屈辱历史就会被完全淹没掉，带到坟墓中。

这些农民除了一纸释放证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赔偿。1979年以后对“文革”进行

平反，所谓“落实政策”，农民基本是一个被无视的群体。

老人们回忆，在释放后，他们向政府要求赔偿，但政府把责任归到四人帮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如果都要平反赔偿，就是把上海卖了也不够啊。等国家富强起来再说吧。”农民们体谅国家，那就等吧。

可快4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这么久，国家这么强大了，我们仍然没有等到赔偿，我从26岁到36岁，劳改10年，就没有一分钱工资？到哪儿都被拒绝，现在连法院的门都进不去了。”一位老人说。

农民们用《国家赔偿法》上告，但得到的答复是该法只适用于1995年1月1日以后的问题，法律的原则是不溯及既往。

朱碎夫因“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刘少奇”的罪名被判了20年，他说自己在监狱里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折磨，名誉上也受到损失，在纪录片里，他希望“政府根据党的伟大政策”，能不能“给点补贴”。

这些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过程中遭到的冷遇，他们的无助和绝望，在徐星看来感同身受。“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弃儿。”他说。

◇ “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徐星有过辉煌的青年时代。1981年复员回京后分配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1985年，这个清洁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

“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1980年代人们对文学的狂热。《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都来采访我，每天都有文学爱好者来店里找我交流，不夸张地说，烤鸭店的收发室收到全国各地写给我的信，最多的一天摞起来能有一公斤。”徐星说。

这样的名气让烤鸭店的领导很不满，小店容不下大佛，“他们开始暗示我离职找别的工作。在计划经济下，一个人离开体制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丢工作的人，社会上一般会认为你犯事儿了，比如偷东西、强奸什么的才会有此下场，没有单位到处会遭白眼。那时，王朔在医药公司收药，舒婷在灯泡厂装灯泡，北岛在铸件厂做工人，芒克在医院看大门，陈建功在房山煤矿当矿工，印象里，我是这拨作家里最早离开体制的。”徐星说。

离开了月工资30多块的全聚德，徐星就剩单位分配的这间地下室了，1980年代后期跟妻子离婚后，地下室判给了前妻，但他还是有居住权，这个南城的地下室成了京城文学圈的沙龙，后来很多大名鼎鼎的作家都是这个沙龙的常客。

1988年，徐星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作家班的学员，同学里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等。谈起和同时期成名或者有相似背景的大腕儿作家们，徐星曾自嘲说：“我除了穷点儿，可活得挺好的。”

仅靠微薄的稿费和教外国人学中文，徐星的生活过得异常贫苦。1989年，他在一家叫《华人世界》的杂志当了一段时间编辑，当年4月，这份杂志的封面出了大问题，直接被封停了。

“这是我最后一份工作，从此再没有上过班，杂志社倒闭后，我的档案也被弄丢了，没有社保，办不了低保，甚至连父亲留下的房子都无法继承。”徐星觉得，自己和那些坐过冤牢的农民的遭遇何其相似。

“在国内去政府部门办事情的时候，永远会面对一个小小的封闭的窗口，你甚至看不清坐在里面的人的长相。他们高高在上，冷酷无情，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如此卑微渺小，非常令人绝望。”

徐星说，他只拍人物，不拍事件，后者他驾驭不了，“小人物的命运是最令我着迷的，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 当年的恐惧至今没有消失

于是，在《罪行摘要》里，14位“小人物”们在田间地头，在院坝酒桌上，向这位北京来的“小人物”讲述了一个个荒诞得令人窒息的故事。

周明夫因“偷听敌台，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被判10年。他有一个小收音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都在用电台做宣传，周明夫偶然听到了信号更强的苏联广播，被人告发。在被绑走时，来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当时房间里就三个会计，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徐星说。

在片子里，周明夫和老伴一边干着农活，一边嘟囔着：“文革”时，人都是“没有心”的，谁压倒谁，就上去垫一脚自己就高一点。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更爱毛主席，都是为了这个。

比起大多数难友来，周算是幸运的，老婆还等了他十年。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因“反革命罪”被抓，为了避免成为“反革命”家属，很多人的选择了和亲人“断绝关系”。

翁志渝被刑讯时，被要求交代“反革命组织”的名称，他回答“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对方用枪把敲他的脑壳，不承认就继续就敲。

翁知道不编个词儿是混不过去的，他想起在报纸上看过“启蒙”，觉得启蒙是中性词，不反动的，于是就“交代”了。审讯组后又加上“领导核心小组”，“启蒙领导核心小组”就成了翁志渝和其他几个农民的反革命组织名称。而那几个老乡“同案犯”完全不知情。

“同案犯”程德华和翁40年多年来一直都有矛盾，程认为就是翁志渝“启蒙”两个字，把他害得妻离子散。

徐星在拍摄的同时，也试图在化解这两位老人的矛盾。徐拿自己说事儿：“在刑讯逼供下，别说‘启蒙’，就是‘反革命’我也认了。”

在徐星的劝说下，翁和程冰释前嫌，酒桌上，翁志渝不停说“我们几十年都是老朋友，真的老朋友”，两位老人抱头痛哭。

徐星发现，这些农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当年的恐惧，直到今天也没有消失。“这种恐惧可能是下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已经完全在他们的血液中了。”

他们依然会警惕说错话，得罪政府遭到报复。徐兴林当年被朋友举报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朋友是彻底交不得”，他说。

徐兴林曾说过，“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

“年轻人会认为，以前发生过那么多残酷荒诞的事情，一定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这种说法是我不能同意的，”徐星说。在杭州看片会外的展板上，有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最近，徐星在筹备一个新的纪录片《告密者》，将回放一位现年80多岁的学者的“特务生涯”。他在“文革”期间受“组织”密派，潜伏物理学家束星北身边，监视其言行。“文革”结束后，所有的部门都不承认他这一段秘史，他也因此遭受排挤打压。

“历史被层层谎言覆盖着，其实只要有一些有力量的细节，就能戳穿这些谎言。”徐星说。

□ 摘自《南都周刊》2014-04-21

~~~~~

【历史镜鉴】

这些老女生究竟要干嘛？

• 冯敬兰 •

有这样一群老女生，不合时宜、不随大流、不看天色，旷日持久地干着一件事，就是要弄清楚文革初期她们就读的母校发生了哪些事？校长是怎样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的？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暴力惨剧？她们悉心寻找当事人、亲历者，以谦卑的态度以心交心，召集各种座谈会，邀请本校老师、校友和外校同龄人，共同回忆、探讨文革历史。不仅如此，她们还在校友中发动捐款为死难校长塑像，举行隆重肃穆的纪念仪式，自己编脚本、自费出纪念光盘。她们与专事文革研究的电子杂志《记忆》共同编辑本校文革专辑共6辑数十万字，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了一所中学的文革（初期）历史样本。她们不惧怕谣言、不在乎谩骂，把事儿越做越细致越做越深入，不仅吸引了国内媒体的年轻一代记者，也有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主流媒体，纷纷前来对她们进行采访报道。《南方周末》则派出优秀记者独立进行采访，历时两个多月，以四大版面深度报道。这些和文革过不去的老女生，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实验中学）的老三届学生，都已年过花甲，“家庭出身”各有不同，文革中分属不同派别。直面历史，拒绝遗忘，用拱卒精神推动文革反思，促进社会和解，对她们来说，既是动力，也是目的。

1966年8月5日下午，原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一3班部分干部子女发起游斗五位校领导活动，途中不断有学生加入，以高一和初二为主，还有大量其他年级的围观者。最终局面失控，少数激进者暴力殴打老师，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几位身心受到严重创伤。这就是近年来流传在互联网上的“女附中八五事件”。文革初期，全国、全市打死校领导的中学难计其数，为什么“女附中八五事件”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是这所女中集聚了众多中共高级干部子女；二是该校师资、生源为当年北京乃至全国上乘，却开了文革暴力之先河；三是1966年8月18日高三学生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因此被学界看做一个特殊符号。当然，最重要的是，“八五事件”率先由女附中学生披露。几十年来，女附中师生没有忘记那一天，校长之死成为她们的心中之痛，许多人对“八五事件”做过调查、披露、回忆和研究，粗略统计如下：

1966 8月6日及以后,张镭、苑秀琴等多位学生看望被打伤的胡校长
1966 张镭等参与西城区36所中学打人情况调查并写调查报告
1966 张静芬老师给王晶垚先生寄匿名唁函
1967 王南芬做八五事件调查
1986 王友琴:《女性的野蛮》
1995 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1996 胡志涛:《八五祭》
1996 冯敬兰:《记忆的疮疤》
1999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
2000 王友琴:主持“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2001 伏生:《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
2001 张敏:《文革与人生》
2002 于羚开始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8.5资料,历时三年
2004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一书在香港出版
2006 刘秀莹:《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刻怀念的好校长》
2006 叶维丽:《卞仲耘之死》(The Death of Bian Zhongyun)
2006 王友琴:《八月,让我们纪念受难者》
2006 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2006 裕雄:《良知与责任》
2006 刘进:《给梅树民老师的道歉信》
2007 刘沂伦:《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
2007 冯敬兰:《烈日下的集体谋杀》
2007 陶洛诵:《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
2008 叶维丽:《动荡的青春》
2010 刘进:《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学校存档)
2010 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也谈卞仲耘之死》
2010 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
2010 于羚:《反省历史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2010 刘进:朱学西访谈录
2010 刘进:李松文访谈录
2010 冯敬兰等五人:《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2010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
2010 敏一鸿:《追究卞仲耘惨案真凶》
2010 《张静芬老师的选择》(黄艾禾报道)
2010 庄生:《食指》
2011 庄生:《历史不容忘却》
2012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2012 张亦鸣:《从卞仲耘之死说起》
2012 叶维丽:《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2012 叶维丽:《与安迪·沃德商榷》
(截至到2002年初)

其中,高一学生王友琴(供职美国芝加哥大学)从校长之死开始了她对文革受难者的漫长调查和追溯过程,在海内外获得广泛影响。初三学生叶维丽(供职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院)经过四年调查,2006年在美国发表了英文版学术论文《卞仲耘之死》,2007年又在《二闲堂》网站发表了中文版译文。不过,没有一个人在采访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刘进。

四年前，我曾看到刘进打印的一个调查采访摘要，是300多人次的一个表格，简要记录着时间、地点、受访者、谈话要点等等，条理清楚，一目了然。她知道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所以在调查中，重要细节一定要反复论证、多人求证。刘进用十年时间，找到当年在校的老师、学生120余人，做的采访笔记、电子邮件、电话记录装订成册几大本。她退休后更是无冬历夏，背着沉重的大书包，有时一天走访几处。同学们开玩笑地叫她“铁人”。

我曾经问过刘进：既然北京市委1966年8月6日的《每日快报》白纸黑字记录了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五位校领导，暴力致使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死亡的事实，说明你们当天（8月5日）就知道游斗校领导的组织发起者，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力气，进行艰苦的、旷日持久的调查？刘进的回答很简单，她说，事情过去多年，有必要找到“八五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目击者和受害人中的幸存者，一起还原真相。

真相在哪里？锁在人的心里，尘封在官方的档案里。几十年的时间，是一个人的大半生，甚至是整个人生。无论他（她）们在文革中处于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没有人愿意打开心锁。你要干什么？是每一个受访者本能的反问。而有关文革的档案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能否解禁，无人知晓。真相，始终在困境中。

由刘进牵头的调查和采访，打开了一个个心锁，激活了当年在校的老师、学生、工作组成员120多位的记忆。大家既有口头回忆，也有书面证言，有的还提供了当年的日记、笔记、收集的大字报、批判稿，依靠众人的力量，让文革初期（1966年6月至8月）校园里发生的主要事件得以基本厘清。

说实话，这种深度调查，只有刘进能够做到。刘进是文革前为数不多的学生党员之一，是文革初期工作组进校后的学生代表会主席，认识的老师同学多。她为人质朴诚实、襟怀坦白、宽容大度，又能担当。她善于听取各种意见，不论多么难听的话，她都听得进，理得清。老师、校友更容易信任她，愿意对她说出心里话。宋彬彬于2003年回国定居，一边照顾病重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一边参与刘进的调查。她们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也是自我反思、继续成长的过程。譬如她们有一次去看望“八五事件”受害者梅树民老师，受到老师不客气的质问：“我们被游斗时，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我们？”后来经过和梅老师多次推心置腹地交谈，才逐渐解开老师的心结。2006年刘进给梅老师写了道歉信，为文革初期带头写第一张大字报、“八五事件”中没有挺身保护好老师，做了深刻反省。梅老师不但谅解了她，还帮助她对两万多字的调查报告给予逐句逐字的批改校正。宋彬彬因8·18给毛主席戴袖章被妖魔化几十年，背着杀人、打人、“武斗符号”等罪名，一直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自从参与校友们的调查、反思活动后，她渐渐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勇敢地站出来，在电子杂志《记忆》发表了《四十年来我想说的话》（见共识网），澄清事实，反省自己，放下包袱，并为文革中写第一张大字报、“八五事件”中未能尽责导致校长之死而公开道歉。

如果说刘进是调查真相的带头人，罗治就是一系列反思与纪念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她不仅作风干练，还事无巨细，七年来倾全力做了几件大事。

1、为了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怀念，发动历届校友捐款塑像。2007年实验中学90周年校庆之际，为卞校长塑像的倡议分别由高中1965届海外校友沈乾若、华欣以及高中1967届校友张育芷、罗文冬和罗治提出，于校庆前得到了老校长王本中、时任校长袁爱俊的支持。5位倡议人有3人旅居海外，具体运作的任务就落在了罗治和张育芷身上。2007年9月24日，1965届高中校友高宁、郭平英、刘文莲与张育芷、罗治共同策划，邀请原女附中各年级热心校友，商议为卞校长塑像之事。她们决定成立一个“执行小组”，成员中年龄最长的年近70，最小的也已60开外。1967届高中生张育芷身体极差，长期受“慢阻肺”的

折磨，吸着氧气还在四处打电话，联络、知会更多的校友。1962届高中生刘蓓蓓一边和癌症抗争，一边参与“塑像”的各种协调工作。她们在三年多时间里，耗尽了生命的精气神，塑像落成、举行揭幕仪式后不久，她俩相继病逝。

“执行小组”邀请了若干联络人，从62届高中到67届初中的各年级，起初有刘蓓蓓、于凤丽、张丽云、于羚、牛立、傅珉、刘煜鸿、李国维等人，后来又增加了程东、鲁克全、莫莉、王南芬、王国云、沈佩言、方甜、陈琨、徐海伦、胡一玲和胡嘉芬。

“执行小组”发出了《关于给卞仲耘校长捐款塑像的公开信》，公布了资金募集方法。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多次召开碰头会组织协调捐款塑像的各项事宜，各班的校友利用节假日聚会、校友网、电话、邮件等形式，联络了更多的校友。经过不懈的努力，收到18个年级44个班共计499位同学的捐款，¥93250.23元、\$200元。

不要小看这点钱。罗治她们认为，参与的过程也是唤醒记忆、反思的过程，因此一定要让更多的校友参与。其实，实验中学历届毕业生中的实业家、文艺明星很多，由他们中任何一位掏钱都不难，但是一份五十元、一百元的捐款，更有意义。“执行小组”设计制作了纪念卡，卞校长遗像居中，两边写着：“黄昏血色往事何堪回首 / 绿地晨曦今朝勿忘反思”，回赠捐款者。65届高中生高宁和郭平英虽然早在文革前就毕业离校，但她们对卞校长一直心怀感念，对母校文革之初的“八五事件”持强烈的批判意识。高宁是捐款塑像活动的总指挥，郭平英是塑像工作的艺术总监。“执行小组”的历次碰头会，都在郭沫若纪念馆的小会议室召开。捐款集中后，刘小沁和郭平英请中央美院著名雕塑家孙家钵先生为卞校长制作雕像。孙先生慨然应诺，不计报酬（最终只收取了材料费）。铜像并非艺术的再现，而是校长温婉气质的还原。艺术家根据卞校长生前留下的几张照片塑造出了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女性，一个善良慈祥的母亲。

2、2011年5月7日，母亲节的上午，在实验中学东楼会议室，罗治主持了隆重肃穆的卞仲耘铜像揭幕仪式。与会者不仅有本校老三届、文革前和文革后毕业的校友50多位，也有外校同代人参加。北京八中老三届学生钟离满为揭幕仪式提供了很多帮助，他说不少学校都打死了校长，有的甚至更为残暴，但都选择了集体沉默，唯独女附中校友开始了对文革的集体反思。诗人郭小林为揭幕仪式创作了长诗《悼念一位母亲》，65届高中生郭平英的深情朗诵，让与会者触景生情，纷纷流下热泪。一位外校与会者的母亲，是北京女一中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王毓真，与卞校长一样死于文革初期的迫害。他说女附中老三届学生的集体反思和纪念活动，让他非常震撼。所有与会者都在这个特殊的纪念会上被感动。有同学在校友网留言：昨天的活动非常震撼，非常成功。几位校友代表的发言，发自肺腑，感人至深，引起大家深深的回忆和反思。虽然大家在文革中的处境不尽相同，但是今天直面历史，深刻自省，让我看到了女附中学生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这样的氛围太感人了，也太难寻觅了。只有回到久违的母校，才能得到这样净化灵魂的精神洗礼……

3、制作纪念光盘。为了让更多的同龄人和后辈了解真实的文革，大家决定将揭幕仪式及捐款塑像的经过编辑制作成光盘。罗治自写脚本，大家献计献策，分头请人剪辑编辑，配音配乐，这群老女生终于心想事成。2012年3月7日，由校友、法律学者李红云策划，罗治主持，借北大法学院会议室召开了光盘发放座谈会。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参与捐款塑像的1973届和1980届后辈校友，再次出资制作了2000张纪念光盘，发放到实验中学后学圈中，以期让年轻一代了解文革，牢记“校耻”。一位年轻老师看完光盘后泪流满面，她说到实验中学工作多年，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深为老校友的集体反思行为感动。

4、2014新年伊始，罗治和网刊《记忆》主编吴迪一起主持了部分老三届学生“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座谈会。参加聚会的有北京四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现实验中学）、师大附

中和清华附中的“老三届”学生陈小鲁、计三猛、印红标、吴迪、丁东、邢小群、米鹤都、卜伟华、郭小林，和刘进、宋彬彬、于羚、罗治、郝新平、顾谖、叶维丽、冯敬兰、李红云等，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党史的两位学者，来自《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财经》杂志和《记忆》网刊的年轻记者共20多人。

讨论会从“八五事件”说起。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正致力于推广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服务的顾谖，当晚就要出差，也拉着行李箱出席了座谈会。作为高一3班学生，她具体介绍了班里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组织游斗校领导的情况，并尖锐指出当时学校的阶级斗争教育，已经在学生头脑中牢固树立了血统论、等级制的观念，致使一些干部子女狂妄、冷血，文革初期的暴力行为是水到渠成。

八中的陈小鲁介绍了他公开道歉的心路历程，并对女附中同学们集体还原“八五事件”真相的执着努力及深刻反思表示敬佩，他说我们虽然道歉了，但是对八中文革初期的过程和发生的事情，记忆已经很模糊了，要向你们学习，争取如实还原八中文革历史，以告诫后人。几位文革研究学者纷纷指出，在还原历史真相时细节很重要，并指出要从历史的深度、人性的高度去认识发生在中学生中的暴力行为。丁东强调要分清当时最高层、中层和下层的不同责任，文革的发动者要负最大的责任。米鹤都说女附中校友们打破家庭出身的界限，把过去所谓的“红五类”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团结到反思文革上来，是个创举，很不容易。印红标提出反思文革要“普及”到现在的几代年轻人中，他们普遍不关心、不了解文革。对我国的当代史被割裂，导致极左思想回潮、美化文革的现象，值得十分警惕。卜伟华认为文革研究要注重事实考证，写文革史绝不能想当然，有一说一，有错要及时修正。邢小群表示，对师大女附中的学姐们做的努力非常钦佩。郭小林用拱卒比喻大家做的事情，他认为推动历史进步就要靠不懈的“拱卒”精神，一点一点地推动。叶维丽认为还原8-5真相，反思文革，是为了警讯后人，而不是侦结刑事个案。她说，虽然国内文革研究还很不深入，但我们要以历史担当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搞下去。现在从事文革研究的人不是多了，而是还很少。她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直面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

5、2014年1月12日上午十点，由老校友罗治、刘进、牛立、叶维丽和老教师金元、老校长王本忠共同策划的“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在实验中学召开。电话联系到了健在的、行动方便的老师20多位，他们悉数到达会场，一共25位，朱学西老师89岁，张静芬老师85岁，都早早来到了会场。多年来，老师们之间也很少见面，这样的聚会让他们很激动。

罗治主持了见面会。刘进、宋彬彬作为文革初期工作组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先做了道歉发言，触景生情，她俩都是泪流满面，不断哽咽地说完了多年埋藏心中的话。1965届高中生高宁介绍了卞校长塑像的捐款、制作、安放过程，6年中两个参与策划和具体实施的校友刘蓓蓓和张育芷已先后病故。她说，这个过程很难，就要靠一些人推动，刘进、宋彬彬也是推动力。叶维丽介绍了“八五事件”的调查、研究和参与这一工作的各位同学。

“八五事件”受害者胡志涛校长的女儿、校友丁东红发言指出，“八五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近现代史的事件，历史符号不幸落在我校，一定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以历史责任感为事件作证。都知道现在做这个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不做，就会让真相淹没于历史中。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每个人当时都有自己的位置和活动，都会留下记忆。今天发言的同学都是很勇敢的，我也知道很多同学还没有胆量，你不敢面对历史，你的后代也要面对。反思不会增加仇恨和苦难，反思是为了和解。老教师王本忠、储瑞年、丁德泗、张春条、艾立川、金元、朱学西等都做了恳切、深刻的发言，他们说，刘进、宋彬彬的道歉令人感动，“八五事件”许多人都是见证者，也有当场劝阻的老师学生，包括刘进、宋彬彬，她们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今天同学们来道歉，其实老师同学从来不是两个对立面。有的老师说，当时自己年轻，也批斗过自己的

老师，以至于多年不能面对。多位老师表示，需要他们做什么，一定责无旁贷。

老师们的体谅和宽容，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学生。有的学生当场起立发言，说自己曾经带头批斗过班主任，一直难以说出一句对不起，老师如今年过九十，不能到会，我一定要在春节前去看望老师，当面说声对不起。有一学生说，当时自己很左，认为斗黑帮是革命行动。8—5现场看到宋彬彬劝阻打人的学生，还不理解，我远远不如宋彬彬。自己也批斗过班主任，借此机会表示道歉。

6、今年春节前夕，罗治再次组织校友慰问了老教师。

作为这群老女生之一，我对学姐刘蓓蓓、高宁、郭平英、刘进、宋彬彬、罗治、张育芷等多年的付出，非常敬佩。作为当时的低年级学妹，我为加入到这个群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自豪。

应网易新媒体之约，我从今年2月开始写《我的文革纪事》专栏文章，以每周一篇的节奏，写到了8月21日的最后一篇《我的1968》，终于松了这口气。我已经多年不在编辑的催促下写作了，之所以接下这活儿，只因为我看到网易有一个关于文革的调查，拥护文革和反对文革的比例（以我看到时间计，抹去零头）竟然是22万：2万，这让我很吃惊。毫无疑问，这种对文革的理想化期待，完全源于当下社会自上而下的腐败带给民众的绝望感。实际上，文革对于法制、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毁灭性破坏，正是当今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的重要源头。

作为亲历者，我知道我有义务原原本本说出自己在原师大女附中这个特定环境中经历过的文革。写自己的过程，也是梳理母校文革早期历史的过程。回溯文革往事，打开记忆闸门，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尽管我从事文革问题写作已有些年头，但在写作过程中，依然受到强烈冲击，几次难以继续。大量文革日记、笔记、检讨书、大字报、揭发信看在眼里，堆在心中，以往的所闻所见，同学朋友的惨痛经历，一幕幕浮现，常常使我夜不能寐，多次让我泪流满面。写作的过程也是反思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以前我只记得自己在文革初期被批斗、被孤立，现在才猛然发现，我受的只是小委屈，不知有多少人像我的同学们那样，把尊严被践踏、亲人被残害的可怕遭遇深深埋在了心里！说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浩劫，一点不过分啊！

感谢网易新媒体的年轻编辑，在喧嚣浮华的大环境下，有一份难得的沉静和从容来追溯文革的历史。感谢网易博客和搜狐博客能给予我的每篇纪事以显著位置，让数百万网民和读者浏览阅读和转载收藏。德国社会对二战的反思，正是从1970年前后年青一代的追问开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纪事》，能激活更多亲历者的记忆，能唤起中国年轻一代对父辈的追问，从他们那里发掘文革真相，这正是对历史的抢救。感谢为我提供大量资料的朋友们，感谢向我敞开心扉，说出自己在文革初期破四旧中有过可怕遭遇的同学们。是你们的帮助，让《我的文革纪事》所有情节、细节都有出处和源头。是你们的鼓励，让我把文革中真实的、激进的、幼稚的、丑陋的自己展现出来。

欢迎朋友、校友、同学、网民和读者的指正和补充，我以谦卑之心期待着。

2014年9月1日

□ 来源：共识网

~~~~~

【往事非烟】

### 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之三）

• 扬子浪 •

（前言见本刊 z k 1 4 0 8 c）

（日记正文上接本刊 z k 1 4 0 9 a）

一九六七年

1月16日

清晨两点，联络站的同志就把我叫醒了，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下午组织一次促进北京日报新生的宣传示威游行活动。我被推进组织组参加工作。

上午去地院、政法、矿院联络，在回来途中司机（吉普）撞了一个人，司机与车都被扣了。我们因为有事，只得马上离开去乘公共汽车。被撞的是一个老者，鼻口流血，卧地不起，伤势较重。虽然对此肇事事件，我毫无责任，但想到我第一次乘小车就碰到这倒霉的事，就快快不快，特别对那个司机总觉得有些内疚。

下午的游行马马虎虎还可以。

1月17日

北京日报的问题到了白热化，尖锐化的程度。我与红卫兵指挥部的董跃昌谈了一次，深觉问题不少，对“星火燎原”疑心重重，看来这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人不在工厂就在“星火燎原”。北师大井冈山在北京日报，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我的思想达到了高度兴奋的状态。

1月18日

上午讨论形势。我写了一份大字报“星火燎原的成立与红卫兵指挥部的土崩瓦解”，尖锐地指出“星火燎原”是保皇组织，是保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办报方向，和旧知识分子对办报的垄断权的保字当头的组织。并且高度地赞扬了红色工人造反派，好得很，好得很！但是大字报未能通过，甘斗他们不同意写出去，而我又急于走，不能以个人名义贴出去。我追求彻底，不允许任何折衷，离开北京日报时，心里惴惴不安。

1月19日

几天极其紧张的兴奋状态把我搞得疲劳不堪。同学们都说我呆了，劝我好好休息。

下午狠下心去上海，与红梅7朵与“广东”等乘上了9551次列车。要离开北京了，但我的半颗心还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北京日报。我们乘坐的是军车，能躺下，车厢内没有灯，大家挤在一起，唱着雄壮的战歌，真有些去长途征战的样子。上海将会怎样呢？战斗的上海，欢迎我吗？

1月24日

到上海以后，就住在公交公司的汽车三厂接连两天参加了公交公司的联委会筹委会。两天会议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我坚定地站在造反派一边，对红卫军一些领导人的错误和阴谋进行了针对的斗争，同时也力争联合其他革命组织。

听闻“北京日报”新生，心中有难言的高兴，我多少也为她出了一份力啊！又听说北大师生以军训编制四处夺权，夺了高教部，中宣部，组织部的权，十分振奋，哎，我如果在北大那也有多好啊！

“小广东”这个人真是罕见，内心无限羡慕。她的精神世界如此开朗，如此豪放，无拘无束，她背的旧世界、旧文化的包袱，显然比我轻多了。而我常常被因袭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

1月27日

复旦孙悟空（谭启泰、欧阳靖）开始拼命反张春桥；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内部斗争也异常激化，工总与二司，东方红与红革会，红三司与红革会等都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同志们四出调查。中午去华师大找于静蕾同学，想了解一下整个上海的情况，结果未能找到。上海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反扑，我已经嗅到了暴风雨前浓重的气息。

汽三造反派完全是二兵团直接控制下的地方。他们实行的完全是一套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汽三对全公交公司的左派联合，本厂的左派联合根本不热心，甚至阻挠；而对搞二兵团区指挥部却大卖力气，整整抽了五个人去搞，这合适吗？过去曾经是革命的汽三造反派今后可能往哪儿走呢？二兵团到底怎样呢？

1月29日

抛出大字报“坚决捍卫无产阶级大民主”，对汽车三场造反派一小撮头头一系列非法绑架，拘捕事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谴责，并且作了不祥的预言。把胸中满腔的怒火暂时发泄了一下。红革会的一些头头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分裂主义者，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行动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嘴脸。

1月31日

把持汽车三厂造反派大权的人，实质上是一小撮政治扒手。当前三厂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夺权斗争，就是造反派内部的革命左派向一小撮政治扒手社会渣滓夺权的斗争。今天马西沙，黄虹坚，我等9人在上海分行（中国银行），解决临时工的工资发放问题。我与马西沙有不同意见，因此下午我就走了，我认为他是错误的，反对经济主义指挥部不可能解决和答应要求，但想不到他们竟然迫使这些人答应了要求。

马西沙“心狠手辣”“脸厚皮硬”看来是一个干事的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想创造历史的人绝不应该害怕弄脏自己的手”。而我却非常软弱，单纯得可笑，谨小慎微，拘泥于小节，死要面子，唯恐让人不愉快，得罪了人。如果继续下去，再不改正的话，就不可能坚持住残酷的斗争和考验。不过他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善于与人讨论，太过份地奇异地争强好胜，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因此它很难与一般同志相处的。不过我们这十个怪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神经质和特色，处得到还不错。

2月2日

2月1日晚7点，汽三造反派队委、干事联络员和北大、清华同学、师大同学召开扩大会议。这次异常激烈，斗争复杂的马拉松会议，一直开到今晨5点。在会上我强调了矛盾转化，猛烈地攻击了打人、捕人的非法行为。

我很激动，我被这些狂人的流氓行为气愤到了顶点。这是一群扒手，政治流氓，社会渣滓的混合物；我发誓要打倒这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挑出来的牛鬼蛇神。

仔细学习了《红旗》社论，觉得我写的“坚决捍卫无产阶级大民主”中有些论点预见到了《红旗》第三期社论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情况，要加强阶级观念。

张春桥、姚文元最近传达要点摘记：

- 1.矛盾转化这一点很多同志没有意识到。
- 2.一个组织不敢辩论，只用砸、论、抓会走向什么道路？
- 3.造反派中有中间派、右派。工人队伍钻进了一些坏人，要考虑应付更复杂的局面，有反攻倒算，有投机，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
- 4.现在打击面过宽。发动进攻时，不要过份强调干部的划分，群众起来就要注意了。“怀疑一切”是无政府主义的口号。

2月8日

接连两天晚上开了串联会，群情激昂，看来形势大好。已经开始公开点刘招娣的名了，真

像工人同志说的刘家的天下是鬼子尾巴藏不了，长不了，刘家村就要完蛋了！

2月9日

上午，在十车队开了一个串联会很成功，群众都起来了。真像所预见的那样，对人民实行专政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2月11日

昨天晚上在顾志华的“火种兵团”的房子里，高中的一些同学搞了一个小小的聚会，意思不甚大。我却滔滔不绝的讲了一通。大学四年，我掩盖自己的面貌处处约束自己，因此班级里关于我的流言蜚语不多。而在“红旗兵团”却肆意地放纵自己，卖弄自己，炫耀自己，欣赏自己，影响十分不好。绝对不能过高地估计自己，过高估计自己，在甜言蜜语面前神魂颠倒是十分危险的。我对自己一定要有清醒的估计，切不能在赞扬面前栽倒。现在还不是锋芒毕露的时候，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尊重别人的意见，好胜心、自尊心太强只有坏处绝对没有好处，总之要尊重同志。

2月14日

在三场搞的大方向是肯定对了。“二兵团”与“工司”的矛盾日益尖锐，看来调和妥协不了啦。最近翻了莫伯桑中短篇小说下集，有几篇相当奇异，有思想，例“遗产”等。但是毕竟是个可怜颓废的浪荡公子，脑子里就是黄的，粉红色的，灰色的东西。

下午去参观了红卫兵电影制片厂，上海人美，新师大造反派联合举办的革命造反派画展，相当不错，这才是斗争的艺术。绘画的表现力与文字相比，优点太多了。林彪同志讲过，我们要把鱼目剔出，但要把珍珠还给人民。这个画展就是一颗熠熠发光的大珍珠。

林彪同志讲过：“要敢于牺牲包括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上。”

对生活我也要抱这个态度，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投入战斗。“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一个人不怕死，还有什么不能舍弃呢？战斗吧！

2月19日

明天就要走了，与顾志华告别，他送了我一本毛主席，马恩列斯语录，心中十分欢喜，政治真是灵魂啊！生活中除了政治斗争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影响着人的灵魂和脉搏呢？难道男女之情有这样的威力吗？那些本来在我的眼里闪闪发光的女性，在这场伟大的风暴中不是也变得暗淡无光和索然无味了吗？政治生活是一个人最高尚最伟大的生活，缺乏政治生活的人就是一具地地道道的行尸走肉。物二（3）的陈敬原是联络站的动态员，她看来很愿意与我谈话和相交，与俞颖似是一个文静矜持但又善词令的姑娘。马西沙、小广东有很多优点，但有一个严重的缺点，他（她）们对自己对我们这批人，自然包括我，都有不恰当的过高的评价，这就是她们狂妄态度的本质，我受了些感染，听了些不合分寸的赞词，便也飘飘然，开口闭口他妈的，颇有些了不起，当然左派的样子了！这是十分危险的、可怕的。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2月21日

20日12：41乘106普客离开上海返京，上海再见了！一年半以后再来拜会你！此次上海之行虽无干什么大事业，但大方向全然正确，斗争策略也很漂亮，打胜了一仗精彩的夺权战，对文化革命的新阶段大联合大夺权阶段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性和理性的认识，比起北京日报那次窝囊的事来好得不可以比拟！

对清华蒯派与八八派之争颇感兴趣，蒯大富，手脚不大方，搞权术打小算盘，搞小动作，将来无多大出息。关于学校新北大公社之事，有些疑虑，回校以后再说。

学校里看来也要搞三结合，光是学生不行，北大就要比清华好！

回校以后到班、年级、系里，切勿以左派自居骄气凌人，还是当小学生，多看多听，抓住有把握的问题，可以表一下态。切不可到处乱试锋芒，弄到树大招风，成了矛盾的焦点，就不好办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将来更加伟大的斗争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切不可卷到班里小事小非的小漩涡中。新交了一批朋友，是斗争把我们聚合到一起来了，但没有技物系，无线电系和数力系的，尽是中文系、历史系、物理系、经济系、哲学系的，如果将来搬到三线去，我又会变得孤独了！战斗的友谊是何等珍贵啊！

2月23日

昨天清晨回到了北京，学校里面已经由乱而治了。经过军训广大同学的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都有很大增长，这是新北大走向杭大的第一步。“新北大公社”2月15日正式成立，我被缺席批准为第一批社员。年级里在批判“星火”（反革命小丑樊立勤的秘书组），系里在批判“抗大”，全校革命师生空前团结，形势大好。

“红旗兵团”解散了，可能离校太久，觉得还有些留恋。

昨晚与徐云辉聊天，她向我介绍了北京日报斗争的情况，也是错综复杂、轰轰烈烈。

今后我何去何从呢？我还能干些什么事呢？北大会不会再发生什么变幻呢？看来我只能收敛一下锋芒了。对小是小非、不是不非还是妥协一些好，稀里糊涂一些好。

今天下午我找任瑚琏谈了一下关于我参加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的问题，他肯定了我一个月前戴上的袖章是正式的。

晚上年级开了批判“星火”头目反动言行的大会。班里也讨论了批判黄仲的问题。整别人的人，到头来，归根结底整的还是自己。

2月24日

下午系里开了批判牛占文及以他为首的“抗大”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我想，对“星火”们也许太狠了，而对牛占文也太温了。

“新北大公社”数力系缺乏战斗力。我想搞一个小组，研究一下批判刘、邓、陶的问题。

2月27日

黄虹坚从上海回来了。这个连一秒钟都不能安份守己的人有趣极了，充满了顽皮男小孩的豪侠气概。

中学关于出身论的争论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出身在一个人的阶级地位里究竟起什么作用呢？千真万确还是毛主席的“重在表现”最正确，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重在表现”是毛主席的，不是彭真的，砸烂彭真的狗头！

文化大革命的轰轰烈烈，错综复杂的形势提出了无数尖锐复杂的问题。需要新的理论发展，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来解释文革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问题。只有这样，群众运动才有信心，才能无往不胜。

十月革命前夕，伟大的列宁完成了《国家与革命》这篇伟大著作。现在，应该有另一篇雄文《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在最近与张春桥同志的谈话中一再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绝对错误的，反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说，建立新的国家机构其实是化无产阶级专政。当前，无产阶级专政最强大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混入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切革命运动和社会意识的改变，最终都要落实在政权问题上。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一月革命的实质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左派革命群众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在这场伟大的风暴中，我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地将有革命性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揭露、斗争和镇压的能力将大大加强，对付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内复辟斗争的力量也将大大加。总之，我们只有不断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最终消灭资产阶级。

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反革命份子乔兼武，伊林涤西凭着高度的反革命嗅觉也从反面接触了这个根本问题“政权”。他们大叫大嚷“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要党政合一，建立革命委员会；要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他们利令智昏，打着改善机构的幌子，实质上想整垮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专政。这是当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专政本身能意识到这个任务，这也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国家机构组织形式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形式与国家机器的组织形式的矛盾（即资产阶级法权余），实质上也反映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但这个矛盾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只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明确地宣告它新的伟大历史使命的群众运动

3月5日

3日郭罗基大字报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当晚引起了轰动。思考一天后，我们贴出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在全校反对郭罗基大字报的冰天雪地中，犹如一枝雪里独俏的“红梅”。

3月7日

从对郭罗基大字报的分析和认识中，我得到了很深刻的教训，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认识是个过程。我们对郭罗基大字报的每一次动摇，都使认识进一步趋向深化。今后，分析问题动摇时，不要泄气，不要害怕，要利用“动摇”、分析“动摇”，自觉地促使认识深化。此外，从对郭罗基大字报的分析中，我找到了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北大“温”字的“秘密”，解剖了十月以来，北大运动的整个纵断面，对北大运动中群众发动面不广等弱点有了一个科学全面的看法。这张大字报的水平在整风运动中是鳌头独占的，它代表了一种思想高度。我再也写不出能超过它的大字报了。在整风中，我想对聂元梓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文化大革命真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大课堂。在实际的矛盾斗争中思潮澎湃，政治水平得到了远要比过去深刻得无可比拟的大提高。“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时机，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要努力地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中学习，把自己培养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and 阶级论者。

王复兴说我的思想方法有一个特点，就是抽象。但我却对自己有一个评价：不如说，我是基本的唯物主义的。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灭亡了，这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我在分析问题，观察形势的时候也能从阶级斗争，思潮斗争、不同的政治力量的斗争，这些方面来观察和考虑问题了。我的3月6日的大字报第一段，就是我个人运用这种唯物主义的一个最好的范例。

3月10日

3月8日孙蓬一同志讲话。我对他的讲话心里不满，觉得他给整风的群众运动泼了一大瓢冷水。9日，在考虑了整整一个晚上后，觉得自己对孙蓬一的讲话错在哪里，有什么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想法，因此于中午贴出了大字报：

《反“老孙”论》——献给反杜林论的拙劣宣传者孙蓬一 扬子浪·文兵

大字报贴出后马上引起了轰动，从中午12时直到深，以致第二天，围看的人络绎不绝。大字报上写满了批语，有嘲骂的、有赞扬的，看来我的大字报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在为真理而战、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为整掉北大的“温”字而战。我将永远前进。

中午，大字报贴出去不久，在29楼北面碰到老孙骑车而过。我把他叫住了说：“老孙，29楼东墙有一张关于你的大字报，快去看啊！”。他疾车而往，我和顾志华尾随而去，只见孙蓬一在我的大字报前伫立呆看了一分钟，然后面带不快地飞车而去。我觉得不快，他为什么连这张大字报都不愿看完呢？我的大字报有个人情绪，有些提法太激烈太过头了，对孙蓬一同志使用了十分辛辣甚至带有不负责任的攻击性语言。一方面是个人的主义作怪，发牢骚；另一方，的



确是希望批评得尖锐些、泼辣些，希望孙蓬一同志能听得进去。而他却连大字报没看完就走了，我是多么不愉快啊。

徐云辉在我的大字报上贴了一张小字报。大意是：扬子浪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十足的风头主义到看不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客观事实，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值得深思。扬子浪之流可以休矣！

还有些人说我只是卖弄风骚而已，当然，其它的嘲骂还大有所在。我扪心自问：我当真是从十足的风头主义出发吗？我不否认我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但把我这张大字报说成是风头主义的产物，是十足的凡夫俗子的眼光。它是老孙讲话的产物；是我对北大整风运动分析的产物；是我对老孙的意见书。

我考虑问题，已经有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我将休息。在最近，形势如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我基本坚持我的大字报。因为我觉得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我是站得住脚的。但我不准备应付辩论，老实说，你有五十张的大字报来批判我，如果不怎么样，根本压不倒我的大字报的雄辩气概。同时，我也不想再另写大字报，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再阐述的了。修正一些错误吧，意思不大。反正第一张大字报的影响是不可抵消了，再写大字报就毫无用处了。

听说今天徐运朴，侯汉清又贴了一张大字报，对聂元梓、孙蓬一同志的两次讲话提了些意见，可能局势要发生变化。我务必保持冷静的头脑，要注意事物的界限；小事小非要服从大事大非。

对于“红旗兵团”的一些老战友，如徐云辉、黄虹坚还是高姿态的好。可我觉得难受，不想见他们。

3月15日

看来历史已经否定郭罗基的大字报了，但是有些问题我还是想不通。

最近几天参加了工代会发票的工作，主要地点在北京玉器厂和北京料器厂。

好几个打得很响的战斗队伍哑了，如“红梅”、“北京公社0363”、“横扫千军”、“北京战斗队”，可惜极了。

北大运动中的缺点，看来暂时不能克服。北大的特殊性会在运动后保留几年的。

3月18日

“无私一身轻”，我一不怕批判，二不怕丢名失利。为捍卫真理，应该积极投入辩论，就算是与校文革有不同意见，又何惧有之。我才廿十几？，大学时代的血性青年，风华正茂，现在不闯荡闯荡、不锻炼锻炼，难道要等到暮气沉沉的时候再斗争吗？青年人抓住真理，就有所向披靡的气概。对错误思想、错误言论，不管它是什么人讲的，都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进行批判。

小广东和马西沙说我谦虚。我说我很狂妄。俞政解释说：扬子浪待人接物比较谦虚，但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精神上很狂妄。

只要我抓住毛泽东思想，我就敢蔑视一切错误思想。光焰万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3月19日

我应该休息一下，整顿一下，检查一下了。应该冷静地考虑一些问题了。阶级斗争是复杂的，绝不是儿戏，我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不能被风头主义拖入错误的泥坑。三星期内不准写大字报，切切此令，必须严格遵守。在我写出了：“彻底制止”批判资产阶级整风方针“错误口号的流行”后，我再也不想写了。我远离了斗争的漩涡。

3月20日

最近看了些毛主席自58年以来的讲话和著作，使我革命精神大振、思想大解放，脑袋里辩证法陡然增加了好几倍，看到高兴处，得意忘形、手舞足蹈、兴奋异常、不能自己。精神粮食何等宝贵啊！

马克思的书与列宁比差了一个时代，列宁的书与毛泽东比更差一个时代。主席分析问题，充满了辩证法，特别善于抓住本质，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往往一句话就把事物的本质道破了。又像洪钟力撞，"洪"的一声就把思想的大门敲开了，顿时令我联想翩翩，收获非凡。而马克思与列宁，往往叙述得繁琐一些，学术气氛浓了些，同时不切合我们时代的地方多了一些。今后，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都要读，但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来提纲挈领，这样一定会事半功倍，效果极好。

3月26日

今天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十周年纪念日。晚上，"中国戏校东方红"为我们演出了京剧革命现代戏《沙家浜》。京戏的容量很大，表现力丰富，感染力特强。扮演郭建光的那个演员，演来英气逼人，是个大有前途的青年演员。

不知怎么搞的，我开始脱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漩涡了，空得难受，心里发慌，有些虚，我是多么渴望斗争啊！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软弱性，这就是我的本质。这个本质在文化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暴露无遗。

3月28日

昨晚，《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罗广斌的爱人胡蜀兴、中国青年出版社"红岩"责任编辑张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红旗战斗队罗广斌同志生前战友陈家俊（成岗之原型）来校作报告，愤怒控诉重庆反动派杀害《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志。

杨益言同志说到了65年江青同志与他们的一次谈话，江青同志问他们："你们知道资产阶级作家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改了九十多遍吗？"。答：不知道。你们知道封建文人曹雪芹写《红楼梦》写了一辈子吗？答：不知道。江青同志接着讲：我准备化十年时间把《红岩》拍成电影，改成歌剧、话剧。江青同志说：许云峰、成岗塑造得比较好，江姐还可以塑造得更好一些。

27日下午四时，陈伯达、戚本禹同志来我校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对教该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晚上，召开了一个串联会。我斗胆上去发了言，效果还可以。今后，我要"敢"字当头，要做自己从未做过的事。

教改提到日程上来了，大批大改好得很！

3月29日

觉得心很烦，书读不下去，一些具体的实践工作也不愿去做，可能光想干出风头的事情了。这种风头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些滋长。

我必须清醒地估计自己，自己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实践斗争。我应该努力补课，多学一些实践的东西，多参加一些激烈的面对面的斗争，少搞一些纯理论的无用的东西。我在高度发挥自己革命性的同时必须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做一个谦虚的革命者。

4月1日

昨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戚本禹同志的重要文章"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中充满了战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刘、邓黑司令部轰了一个重磅炮弹。这篇文章的发表，证明了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取得了伟大胜利。刘、邓是不折不扣的三反份子这个案已经定了。毛泽东思想宣判了刘、邓的死刑。戚本禹的文章好极了，简直溶政治、历史、文艺为一体。恩格斯曾说："世界史是最伟大的诗人"，而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戚本禹同志手里，历史不仅是诗，而是刀，是剑，是枪，是一篇声讨一切害人虫，牛鬼蛇神的檄文，是判决帝修反死刑的宣言书。戚本禹同志哪里是在写历史啊！它是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战斗。狂风暴雨般的红卫兵运动，激励着年轻的革命的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戚本禹同志满腔热血的描述着伟大的义和团运动，它不仅是在歌颂历史上的革命，更重要的他是在歌

颂红卫兵运动！不是吗？头包红巾，腰围红布的义和团战士与手捧红书，肩载红袖章的红卫兵战士不是一脉相承的吗？他们都是群众，都是中国历史的首创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历史学家就应当为他们唱赞歌，为他们大喊大叫。中国历史是一把寒光闪耀的利剑。

车尔尼夫斯基说过，美学不过是一个战场，对极了，任何艺术都是政治的表现，文艺批评的实质就是社会批评。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难道仅仅是一篇文艺批评吗？明明是一篇大义凛然的，正气磅礴的政治檄文。

破字当头，先破而立，破中有立，被历史证实了。在十个月的大破中，在文艺批评的领域，历史的领域不同时也实行了大立了吗？这个大立首先是历史为政治服务的铁的原则，文史正在被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

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不仅针对着刘邓，也刺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我总觉得他用历史在影射着他们，它描绘八国联军的暴虐，俄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们的虚伪，他是在鞭打现行的反革命帝修反。

罗广斌烈士曾说：他在“红岩”中是把梅乐斯当成现行反革命来写的，好极了！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就是把历史反动派当成现行反革命的祖宗，主子，祖师爷来鞭笞的，这是为政治服务的正确态度。晚上全校同学集会庆祝戚本禹同志文章的发表，后又至清华，地院，矿院游行至今晨3时才睡下。

昨晚九点去找过李醒尘，他想组织一个写作组，需要一些同学当助手，让我去。我想考虑一下，应该不应该去？

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是我最坏的脾气，

今天下午我校五四操场召开“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周年，庆祝新北大红卫兵成立大会”，李敦白、聂元梓、蒯大富等参加了大会。聂元梓讲话，他指出：我们现存的教育制度是从清朝末期演变来的，又受了帝国主义教育制度和修正主义教育的影响，是一个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杂烩。这个教育制度在国外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服务，在国内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这句话不错。

4月2日

昨晚，校园外北面，有一储放着二十几万斤芦苇的库房起火，熊熊的烈火映红了半边天。救火回来时，已是清晨3时了。当天晚上清华、北大、人大、外语、体院数万人参加了这场救火斗争。

我班的第一批红卫兵只有五个，没有我，一些老战友都为我不平。我热切想往参加红卫兵但绝不把它当成目标，它并不妨害我继续战斗，我永远不拘泥小节，不让小事小非绊住我的腿。但是战友都是红卫兵，都在为我惋惜不平，因此有些不好！

早上我还未起床，王复兴就来叫我了。我们一行十一人，马西沙、王复兴、黄虹坚，我，任瑚琏，钱凤娟，杨桂香，王渊涛，徐森，陈双基，张文虎，去香山春游。我们11人9辆车，马西沙带我，飞车直奔香山。一路上谈笑风生，你追我赶，春风迎面扑来，心旷神怡，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们游览了碧云寺，卧佛寺，樱桃沟，午饭的时候大喝啤酒过馒头，什么东西都吃，吃得千奇百怪，豪放，随意，真是痛快。

傍晚起大风了，天阴沉沉的，落起雨滴来了。我们冒风顶雨往回赶，在暴风雨前夕，我们像雄鹰一样在公路上飞驰，壮志豪情满胸怀。

我的这些朋友，真是朋友，豪放的，忠诚的战友。往来不过几个月，友谊远远深过了虽相交几年但情淡如水的相识。这样的朋友，我要精诚相开，以全身心相交。

4月5日

今天写了一张大字报“针锋相对迎头痛击”批判黑修养，包括五个部分，以“力四流体红烂漫”名义贴出。

今天是清明节，联动分子蠢蠢欲动，上午三百余联动分子在八宝山活动，下午就到颐和园抢劫船只，殴打游客，（所谓镇压流氓），横行霸道无法无天，颐和园的管理员无可奈何。下午

4时，首都红代会工作组一声令下，我公社红一团全体战士，杀奔颐和园与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农大东方红，钢院919，清华井冈山，革命工人，解放军把颐和园围了个水泄不通，里里外外大搜查，捕获证据确实的联动分子数十名，大快人心。但他们负隅顽抗，疯狂挣扎，谩骂红代会是黑代会，流氓代会，贼喊捉贼，大叫打到联动，镇压流氓，叫人哭笑不得。

4月7日

昨晚，“横扫千军”开会，天南海北乱聊了一气后，就言归正传开始开会，讨论稿件。新华社对外广播部向我们约了稿，要我们写一篇文章，介绍战斗队是怎样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提高认识的，供对外广播用。

4月9日

昨天下午听说，地质东方红等（红色联络站）聚集了几百人准备抢劫材料，我系马上调去了50人，至民族文化宫。晚5点时，地质东方红戒严，封锁民委大院的大门，晚十时半，在广播车指挥下开始对民委大楼发起全面冲击。将我方人员一一拉出，挑起大规模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我们50人浴血苦战，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死守。他们砸玻璃门窗，大打出手，无所不用其极，公开对抗军代表命令，继续武斗，终于在凌晨3时半左右占领了全部房间，抢走了全部材料。我也被迫参加了武斗，简直欺人太甚，可忍孰不可忍。

今晨六时回校，嗓音嘶哑，全身无力，几乎使尽了力量，得几天后才能恢复。挨了打，受了气，丢了材料，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出气，我们北大他妈的太软了。

洪涛、吴传启，卢正义、徐非光他妈的处处与北大为难，绝无好下场。我们的战斗力将得到空前的发挥，新北大决不是好惹的。

4月12日

昨晚6点半，地院东方红纠集北邮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院校，开来了六辆宣传车到北大来捣乱。实在忍无可忍，北大广播台开始教训他们了，自觉聚集来的北大同学掐断了他们的电线。但他们继续不断地诬蔑攻击北大，冲突越演越烈，十二时许，武斗终于被他们挑起来了。北大同学终于渐渐醒悟过来了，万众一心，把他们的宣传车全部推出了北大。这时各校都不断有人往北大冲，地院倾校出动，武斗不断发生。晚三时，中央文革办公室来了三点指示，要他们撤离。接着在大饭厅，开了大会，孙蓬一作了讲话，群情激昂，情绪高昂。

我彻夜未睡，全校同学也是如此，但今天大会依旧召开，很成功。

下午地质又来了一批人刷标语，全部给哄走。宣传车整个被占领，喇叭被拆下，机器被搬下，空汽车也给开走了。新北大三师八团的大旗在车上高高飘扬。物极必反，欺人太甚，反抗就烈。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铁拳不是好惹的。

晚上全校召开了誓师大会，孙蓬一气势磅礴的讲话，不断地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打断。会场上红旗乱舞，群情激昂，空前壮观，一阵阵的欢呼声震撼了整个北大。

孙蓬一的讲话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讲得出来，我决心跟着孙蓬一干，不屈不挠地斗争。

新北大岿然不动

聂元梓红旗不倒

让一小撮反新北大的混蛋们的黄粱美梦去见鬼吧！

4月14日

昨晚谢富治同志接见地质，北大，搞了些误会，孙蓬一讲话竟然大发政治牢骚炮轰起谢富治来了。昨晚几千人集合准备去冲公安部，找谢富治同志评论，亏聂元梓同志阻挠才未得逞，避免了一场大祸。

听小广东告诉我，宋一秀对她讲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在四月10日单独接见了聂元梓，孙蓬一同志，江青同志说过，对吴传启至少要在政治上划清界线。不知是真是假？

4月17日

中央文革14日，10日两次接见大专院校代表，批评了北大，也批评了孙蓬一同志（没指名）。高校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地质东方红，批评北大，这一仗看来打输了，老孙这个家伙头脑太简单，压制民主老子天下第一的作风太恶劣了。

我这次之所以会犯错误，归根结底一句话，没靠毛泽东思想吃饭。以前交游不广没什么消息，老老实实学社论，学毛著，形势大致也看得准。现在有些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老是估摸后台之类的，反而上了当。我这次跟孙蓬一走就是他妈的上了当，谁知道孙蓬一在那儿乱搞什么，坚决不靠小道消息革命。听说有一次接见，孙蓬一问陈伯达同志李雪峰能不能打倒，陈伯达同志笑了一下，老孙回来就乱说中央文革默许了，结果以讹传讹，变成中央文革同意打倒李雪峰，公社发了一个声明，闹了一个笑话！

这一次孙蓬一不可能再搞同样的笑话吗？完全可能。显然几次讲话，江青同志也是偏着我们的，他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地质东方红，她说的与康生、关锋有些不一样没什么奇怪，但与伯达同志有些差别，却使我感到诧异。

4月18日

北大与地质看来还没完，还要打。新北大公社里面是由一篇混蛋，就像帮倒忙的狗熊一样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天到晚挥舞大棒等着打逆流，这种人是十足的暴发户，北大让这样混蛋得势，前景实在暗淡。

徐运朴、侯汉青受打击太不应该了，北大上一次整风就是给孙蓬一打死了，这一次如果再不好好整一下，我看实在危险。但看样子校文革又不想真心实意地来整风，这样下去北大一定越搞越死！

晚上与马西沙、王复兴聊，特别感慨，马西沙满腹牢骚，都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了。到底怎样理解目前形势呢？我看很困难！

运动越进入后期，分歧就越深刻，正如XX同志指出的那样，在六月1日后起来的人中有以一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起来的，由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起来的，它们分别以这两种世界观来估摸，认识想象文化大革命，指导文化大革命。而文化革命越近尾声，就越显出本来面目，必然与很大一部分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抵触。这些人看到革命没有按自己想象的那样发展，它们就会跳出来，拼命发挥自己的影响企图扭转历史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斗争还十分尖锐，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我们务必要把住方向啊！

4月19日

早晨张清华找我，正式通知我去《教学批判》工作。被派往景山学校调查组写调查报告。下午去景山学校。

4月20日

下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普天同庆。这是一个震动大地的事情，毛主席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宣言》指出：“你们的宣言没有棱角，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就是要斗争。这个宣言就是要让你们上台，让它们下台。要有气概，这是震动大地的事情。”

文件要有气概，比巴黎公社还要有气概。这不是上海的宣言，这是北京的宣言，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可以参考《共产党宣言》。理论上要有东西，要有文化大革命，你们的宣言要有历史意义！将来莫斯科革命可以向你们学习。从革命委员会成立，把批判刘邓引向一个新高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次你们还不大做文章？要全面宣布刘、邓、彭、罗、陆、杨的罪状。从你们这里突破一点大做文章，宣布彭、罗、陆、杨的死刑。要讲一些道理，还要有一些具体东西，把最不好宣布的材料写进去，放开手脚大胆些。（伪造的）

4月22日

（《关于景山学校调查报告》）初稿写完了，还可以。我一定要打掉懒字，投身到火热的斗

争中去。

4月30日

最近学校里关于整风问题又开展了一场大辩论，今天上午郭罗基终于忍耐不住跳出来在“0363北京公社”召开的整风串联总结会上作了演讲，除了对这次整风和孙蓬一无政府主义的谴责外，还对上次的整风辩论翻了案。其基本观点与我的大字报“反老孙论”、“彻底制止资产阶级这一错误整风口号的流行”相仿，可我目前处境十分矛盾，老实说老孙错误很多很大，但如果也揪住他不放，那是否客观上配合了吴传启之流呢？

老孙这样下去是十分危险的，今后的形式将越来越不利，我一定要兢兢业业认真地分析形势，后发制人。我们新北大正处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前途十分艰难。

5月5日

昨晚在中关村技术物理系大楼，聂元梓同志给我们几十个人做了一个报告，分析了当前北京市的形势。总的来说形势是有利的，但斗争还十分困难。一定要更加谦虚谨慎的前进。晚上“0363北京公社”故意挑起事件，制造分裂，破坏了纪念毛主席大字报发表9个月的大会。“0363北京公社”的分裂活动已经走得很远了。

5月7日

应该很好地研究对“论修养”、“人的阶级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将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今天晚上广播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章“论修养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一些基本点我都在自己的批判文章中阐述了，几乎同样深刻，但叙述得不清楚，不准确。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人的阶级性”的文章很不错，“事物的实质是在矛盾中规定的”，这句话很可以概括为那篇文章的总的思想。且有两方面内容：1事物的质是有矛盾规定的，2事物的质随着矛盾的发展而发展。

沈阳部队关于培养雷锋的经验，关于引导雷锋去认识万恶之源私有制这一段显然是反动的，是刘氏“人的阶级性”理论的翻版。

5月9日

上午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徐仁同志来我校作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下午去颐和园游泳，这是第四次了，第一次是在5月2日下午。今天昆明湖上风大浪急，游起来十分吃力，但也充满了另一种滋味，与水奋斗也其乐无穷啊！

5月12日

上午去生物研究所献了血，200cc。目前文化大革命无论在全国，在全市都遇到了困难，甚至有倒退现象。反复和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止不了的。在全市、全国连续发生的大规模流血惨案，和大规模武斗事件，标志着政治斗争的异常激烈尖锐和不可调和，也说明了有坏人在挑动。成都5.6惨案死伤三百余人，河南五四惨案也伤亡惨重，各地保守派对造反派猖狂反攻倒算绝无好下场。

最近写了好几篇大字报，皆以“红梅”、“横扫千军”的名义发表，其中有一篇《彻底批判〈井红〉反动思潮，解放二个一大片》提出了新问题，很有影响。老孙在一次会议上好几次提到了这一张大字报。

最近读了陈伯达、艾思奇同志写的关于毛主席四篇哲学著作的辅导材料，收获很大，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林彪同志及其他革命派的中央同志，才紧跟毛主席跨入了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大阶段——毛泽东思想的阶段。而刘少奇呢则由停滞走向了彻底背叛。历史的辩证法是多么无情啊！

5月16日

昨晚陈奎宁与我交谈，向我指出了很多缺点，特别是风头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的确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有很大进步的，但某些问题，却暴露得更彻底了，交的朋友基本上也是好的，但也受到了不少坏的影响。变得更加不朴实，不谦虚，不谨慎和不联系群众了。

不能联系群众，不能与群众一块儿战斗的人决不能做出什么事情来。我应该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群众工作能力，克服形形色色的个人英雄主义余毒。应该谦虚，谨慎，待人诚恳和气，不要去沾染那些高干子弟特有的狂妄，浮华的习气。应该正确的评价自己，评价我们这一帮青年知识份子。“修养”是错误的，但绝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思想改造。我还是应该在斗争中不断反省，不断前进，以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打到一切狂妄，暴躁，歇斯底里，反复无常颓废的小资产阶级表现，坚决打倒！

5月20日

看了电影《南征北战》，这是部江青同志肯定的好影片，观后深感十几年来电影界和平演变的严重性。十几年来我们的电影艺术不是进步了而是后退了，不是日益无产阶级化，而是一步一步走向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解放初期，有很多像《南征北战》这样的电影，带着浓厚的老区气息，一句话带着延安味。整个影片思想性强，纯朴，感人，充满着无产阶级的感情，可是57年以后，这样的风格这样的影片踏遍影坛都找不到了，可见毛主席在63年、64年二次对我国文艺界的抨击，是何等正确，又是何等切中要害啊！

16日晚广播了“通知”，17日《伟大的历史文件》发表，何等激动人心啊！

“通知”和“伟大的历史文件”的发表彻底澄清了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糊涂看法，简单明了地描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图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通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共产党宣言，是毛主席思想的又一颗灿烂夺目的钻石。

“通知”和“伟大历史文件”的发表惹得我脑海里思潮滚滚，数日不得安宁，心神不定。我总觉得这两个文件的发表是毛泽东思想对无政府主义（陶铸）的伟大胜利。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以陶铸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统治和泛滥是十分沉痛的教训，至今流毒还十分广泛，影响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而“通知”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立？，是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不相容的。“通知”是比“十六条”重要得多的文件。

5月25日

四月初掀起的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高潮没有持续多久，就衰落下去了。内战代替了外战，武斗代替了大批判，北京市运动的这种倒退和反复整整持续了一个月。直到5？

16通知重新发表，这种退步才结束。而大批判的高潮也以更大的规模、更大的声势重新发动起来了。

那么倒底是谁充当了这种倒退和反复的策划者呢？在中央应该谁负责呢？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是这次文化大革命重要的教训。“5？16通知”的重新发表就是对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人的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深刻批判。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而积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将“5？16通知”稍经修改后，在1967年5月16日带着全新的意义重新发表了。一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对“5？16通知”作了伟大的评价，而“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讲清楚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问题；至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达到了彻底明了的地步。这必将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进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彻底胜利。

听说公开发表“5·16通知”是主席越过中央文革亲自决定的。因此发表显得突然、匆忙，人民日报有些措手不及。这与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情况有些类似。

5月27日

这几天紧锣密鼓地进行活动，准备取消校文革，建立革委会。昨天下午与聂元梓座谈，晚上密谋至深夜。今天上午又商量了一天，中午与聂元梓、孙蓬一座谈。看来，聂元梓同志比较坚决，有造反精神，而老孙却有些害怕了、有些畏惧了。“新北大”校文革，公社总部的领导核

心问题不解决，北大的问题就无穷期。孙蓬一不干，我们也要逼你上马！目前这？斗争是空前激烈，空前尖锐的，胜负属谁还很难定。

5月30日

看来是退隐的时候了，还是安下心来，老老实实学习一些东西吧！

这几天北京市两大派的斗争不但没有趋于缓和，反而一日紧似一日。

反周总理的逆流一日猖獗一日，真是嚣张一时，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去认真研究，认真阻拦。倒底谁是后台呢？周总理倒底有些什么问题呢？值得深思。

在谢付总理转述毛主席同意的“关于清华运动的四点指示”后，在清华革委会成立前夕，414总部依然成立，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对清华414总部的成立的背景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同时，最近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都相续发表观察员文章和编辑部文章，揭露“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尖锐地提出了“北京日报”为谁说话”的问题。

同时“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借故出走，不知是为了逃避斗争呢，还是为了让底下的同志更加放开手脚地干？这一联串事情的发生真是耐人寻味。真是比流血斗争还要残酷一百倍的不流血的政治斗争。

看来，用无政府主义之类是解释不通的，这一场斗争用抹稀泥来解释也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教训啊！

炮轰周总理与“414总部”的成立，就是当前资产阶级的新动向。我总想写一些文章，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但不知为什么老坐不下来。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